



2010年卷 第1辑 (总第17辑)
No.1 2010 (Sum.17)

会计论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研究所 编

Accounting Institut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ccounting Forum

2010年卷 第1辑 (总第17辑) No.1 2010 (Sum.17)



Accounting Forum

会计论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研究所 编

Accounting Institut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计论坛: 2010年卷. 第1辑: 总第17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研究所编—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095-2361-2

I.会… II.中… III.会计学—文集 IV.F23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5932号

责任编辑: 张从发

责任校对: 吴丽霞

封面设计: 黄薇

内文设计: 黄薇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http://www.cfeph.com>

E-mail:cfeph@drc.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010-88190406 销售电话: 027-88071749 88324370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湖北南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销

889×1194毫米 16开 7印张 150千字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6.00元

ISBN 978-7-5095-2361-2/F·190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88190744

会计论坛

Accounting Forum

2010 年卷 第 1 辑(总第 17 辑)

No. 1, 2010(Sum.1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研究所编

Accounting Institut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编 辑:《会计论坛》编辑部

电 话:(027)88386514

传 真:(027)88386515

电子信箱:kjlt@znufe.edu.cn

通讯地址:中国·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南路 1 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文泉楼南 607 室

邮政编码:430073

本辑责任编辑:康 均

顾 问

葛家澍	王松年	谷 祺
冯淑萍	刘玉廷	陈毓圭
郭复初	于玉林	杨宗昌
毛伯林	易庭源	边恭甫

编委会

主 任:郭道扬

副主任:罗 飞 汤湘希 许家林

委 员:

郭道扬	罗 飞	张龙平
夏成才	唐国平	许家林
汤湘希	高文进	张敦力
季小琴	王雄元	王清刚
王 华		

编辑部

主 任:冉明东

编 辑:许家林 康 均 唐本佑

目 录

盈余管理、政治关联与公司税负	/3
吴联生	
论法务会计鉴定制度的构建	/17
张 蕊 杨书怀	
业绩评价中财务指标的选择——基于价值创造的视角	/25
侯晓红 岳 文	
动态会计要素:基于产权价值运动视角的分析	/33
施先旺	
对冲和风险管理动机:中国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的实证研究	/46
郭 飞 徐 燕	
金融危机对全球会计准则趋同的冲击与思考	/57
余 波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发展动因研究	/70
陈丽红	
中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制度分析	/81
龙子午	
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我国金融稳定性影响研究	/87
操 巍	
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97
杨 帆 汤湘希	

CONTENTS

Earnings Management,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Tax Burdens	/3
<i>Liansheng Wu</i>	
Construction of Forensic Accounting Identification System	/17
<i>Rui Zhang , Shuhuai Yang</i>	
Choice of Financial Indicators 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Based on Value Creation Perspective	/25
<i>Xiaohong Hou, Wen Yue</i>	
Dynamic Accounting Elements: Analysis on the Moving Value of Property Rights	/33
<i>Xianwang Shi</i>	
Hedging and Risk Management Motives: An Emperical Study on Financial Derivatives Usage in Chinese Listed Firms	/46
<i>Fei Guo, Yan Xu</i>	
Thoughts on Financial Crisis and Fair Value Accounting	/57
<i>Bo Yu</i>	
Research on the Drive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dit Firm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70
<i>Lihong Chen</i>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n Features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n Chinese Listed Firms	/81
<i>Ziwu Long</i>	
Empirical Study on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pillover to Chinese Financial Stability	/87
<i>Wei Cao</i>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Enterprise's Value	/97
<i>Fan Yang, Xiangxi Tang</i>	

目 录

盈余管理、政治关联与公司税负	/3
吴联生	
论法务会计鉴定制度的构建	/17
张 蕊 杨书怀	
业绩评价中财务指标的选择——基于价值创造的视角	/25
侯晓红 岳 文	
动态会计要素:基于产权价值运动视角的分析	/33
施先旺	
对冲和风险管理动机:中国上市公司衍生工具使用的实证研究	/46
郭 飞 徐 燕	
金融危机对全球会计准则趋同的冲击与思考	/57
余 波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发展动因研究	/70
陈丽红	
中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制度分析	/81
龙子午	
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我国金融稳定性影响研究	/87
操 巍	
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97
杨 帆 汤湘希	

CONTENTS

Earnings Management,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Tax Burdens	/3
<i>Liansheng Wu</i>	
Construction of Forensic Accounting Identification System	/17
<i>Rui Zhang , Shuhuai Yang</i>	
Choice of Financial Indicators 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Based on Value Creation Perspective	/25
<i>Xiaohong Hou, Wen Yue</i>	
Dynamic Accounting Elements: Analysis on the Moving Value of Property Rights	/33
<i>Xianwang Shi</i>	
Hedging and Risk Management Motives: An Emperical Study on Financial Derivatives Usage in Chinese Listed Firms	/46
<i>Fei Guo, Yan Xu</i>	
Thoughts on Financial Crisis and Fair Value Accounting	/57
<i>Bo Yu</i>	
Research on the Drive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dit Firm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70
<i>Lihong Chen</i>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n Features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n Chinese Listed Firms	/81
<i>Ziwu Long</i>	
Empirical Study on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pillover to Chinese Financial Stability	/87
<i>Wei Cao</i>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Enterprise's Value	/97
<i>Fan Yang, Xiangxi Tang</i>	

盈余管理、政治关联与公司税负

吴联生

【摘要】已有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影响公司价值,但没有关注政治关联影响公司价值的渠道;已有研究发现向上盈余管理存在税收成本,但没有研究向下盈余管理的税收后果以及不同公司的盈余管理在税收后果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的问题。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政治关联对公司税负的影响,并在考虑政治关联的基础上研究盈余管理对公司税负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中国政治关联公司的所得税负担比非政治关联公司高;无论是政治关联公司还是非政治关联公司,向上盈余管理都增加了它们的税收负担;政治关联公司从向下盈余管理中得到了税收收益,而非政治关联公司则无法从向下盈余管理中得到税收收益。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税收与盈余管理可能是政治关联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渠道,政治关联是影响盈余管理税收后果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政治关联 盈余管理 公司实际税率

一、概述

本文研究政治关联对公司税负的影响,并在考虑政治关联的基础上研究盈余管理对公司税负的影响。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指的是公司管理层曾经或者正在担任政府部门职位,它可以理解为政府部门对公司进行行政干预的渠道,也可以理解为公司寻求政府部门支持的渠道。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可能提高公司价值(Fisman, 2001),也可能损害公司价值(Shleifer and Vishny, 1994,

收稿日期:2010-02-02

作者简介:吴联生,男,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公司实际税负与盈余管理”(项目批准号:70572020)的研究成果。

1998),因此,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如何,目前尚未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另外,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到底是通过哪些途径予以实现的呢?已有文献尚未关注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目前已有研究在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机制方面还缺乏认识。

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是经营者运用会计方法或者安排真实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报告盈余为基础的合约(Healy and Wahlen, 1999)。已有盈余管理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盈余管理的动机与手段,较少关注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特别是盈余管理对公司税负的影响。而少数几篇关注盈余管理税收后果的研究,它们仅仅探讨向上盈余管理的税收后果,而没有分析向下盈余管理的税收后果。向上盈余管理可能要多缴税,从而形成盈余管理的税务成本;而向下盈余管理则可能少缴税,从而形成盈余管理的税务收入。显然,向上盈余管理与向下盈余管理对公司税负的影响有着本质性的差别。另外,它们所分析的盈余管理对公司税负的影响,是基于所有公司的平均估计,但对于政治关联公司与非政治关联公司来说,盈余管理对公司税负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为企业管理层与政府部门的联系,决定着政治关联本身会影响公司税负,而这种关系同样会影响基于盈余管理之上的公司税负。

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1998年至2006年的数据,研究了政治关联对公司税负的影响以及在考虑政治关联的基础上研究盈余管理对公司税负的影响。其目的在于回答如下问题:(1)税收是否是政治关联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渠道,如果是,政治关联如何影响公司价值;(2)向上盈余管理与向下盈余管理存在怎样的税收后果,向上盈余管理与向下盈余管理的税收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差异;(3)政治关联是否会影响盈余管理的税收后果。研究结论表明,中国政治关联公司的所得税负担比非政治关联公司高;无论是政治关联公司还是非政治关联公司,向上盈余管理都增加了它们的税收负担;政治关联公司从向下盈余管理中得到了税收收益,而非政治关联公司则无法从向下盈余管理中得到税收收益。

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税收与盈余管理可能是政治关联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渠道,推进了政治关联影响企业价值方面的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时揭示了政治关联是影响盈余管理税收后果的重要因素,并且向上盈余管理和向下盈余管理在税收后果方面存在差异,从而深化了已有的盈余管理税收后果方面的研究。研究结论可以为税务部门提高税收公平性以及纳税工作的有效性提供依据,可以为股票市场监管部门有效执行市场监管提供参考,还可以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支持。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已有文献发现,寻租、侵占利益和保护是政府干预的重要目标(Stigler, 1971; Spiller, 1990; Shleifer and Vishny, 1998)。在制度约束比较弱的国家中,政府对公司的干预尤其严重(Shleifer and Vishny, 1994, 1998)。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自然也存在着政府干预企业的情形,也就是说,政府存在着让企业承担社会目标和个人利益费用的情形(Fan et al., 2007)。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存在负面影响(Shleifer and Vishny, 1994, 1998)。然而,在以“关系”为基础的国家中,政治关联公司更容易向政府寻求支持,而政府资源也更倾向于提供给政治关联公司,显然,政治关联可以提高公司价值。Fisman (2001)发现,印度尼西亚政治关联公司的大部分价值来源于政治关联。贺小刚和李新春(2005)通过调查发现,政治关联公司相对于非政治关联公司来说,其业绩更好。因此,政治关联可能损害公司价值,

也可能提高公司价值。

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一方面在于政府拥有资源,而这种资源则可以直接提高公司的业绩;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实现其社会目标,可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由企业来承担政府实现社会目标的支出。中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政府虽然已经将大部分权力下放给企业,但是,政府仍然拥有重要的资源,比如产品经营权、上市资格等。同时,中国目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大量的社会性问题,比如就业、环境治理等,也等待着政府予以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很多资金。因此,政府给企业提供资源,同时向企业收取相应的费用,它完全可能在中国同时存在。而对于企业来说,这也是获利的一种交易,因为它从政府所提供资源中所得到的收益,往往高于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企业所得税是政府向企业收取资金的重要渠道,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政府与企业进行资源交易的资金渠道。因此,政治关联公司由于享受了政府所提供的资源,因而其所支付的企业所得税也更高。据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假设1:

假设1:政治关联公司的税收负担高于非政治关联公司。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盈余管理的动机与手段,比如,公司为了避免亏损(Hayn, 1995; Burgstahler and Dichev, 1997; Degeorge et al., 1999)、避免业绩下降(DeAngelo et al., 1996; Barth et al., 1999)、达到分析师预测(Givoly and Lakonishok, 1979; Kasznik and McNichols, 2002)以及达到管理层预测(Herrmann et al., 2003)而通过应计项目或者构建真实交易来进行盈余管理,但目前的盈余管理方面的研究,较少关注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特别是盈余管理对公司税负的影响。部分研究将税务成本作为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一个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间接地分析了盈余管理的税务后果,比如,Johnson and Dhaliwal(1988), Dhaliwal et al.(1994)研究公司运用存货计量政策进行盈余管理,Francis and Reiter(1987)分析公司基于报酬政策的盈余管理行为,Maydew et al.(1999),Bartov(1993)分析企业运用资产剥离行为进行盈余管理,它们都分别考察了税务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认为税务成本是影响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它们并没有分析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最终如何影响公司税负。Erickson et al.(2004)是直接研究盈余管理税务后果的重要文献,它对美国企业“做高盈余”行为给企业所带来的税收后果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企业每做高一美元盈余,平均要向税务机关多支付8美分额外的所得税。叶康涛(2006)则对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税收后果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所规避的盈余管理税负成本较为有限,平均每1元操纵利润中,只有1.8分的操纵利润可以规避所得税成本。

中国公司存在着避免亏损、避免业绩下降(Wang et al., 2008)、达到配股线(Yu et al., 2006)等动机的盈余管理。盈余管理无非包括两种:向上盈余管理和向下盈余管理。在公司做高盈余的情况下,即使企业为此付出了税务成本,企业也不敢为了避免税务成本而申明其进行了向上盈余管理,因为向上盈余管理会受到证监会的高度监管,企业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高于税务成本;而从纳税部门的角度来看,如果企业的利润很高,而所征纳的企业所得税很少,经办人员可能面临着玩忽职守甚至包庇企业的责任,因此,纳税部门即使“看透”了公司向上盈余管理,仍然会按照管理之后的利润进行征税。但在企业向下盈余管理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按照盈余管理之后的利润进行纳税,则意味着政府少收企业所得税。对于非政治关联公司来说,政府是不愿意的,除非政府“看不透”企业向下盈余管理。如果税务部门有效地履行了课税的职责,那么,税务部门会按照管理之前的真实盈余进行纳税。而对于政治关联公司来说,它会通过有政治关联的管理层对税务部门进行游说,尽量不要揭穿其盈余管理

行为;同时,政府已经从政治关联企业那里征收了更高的公司所得税(假设1),因此,对政治关联公司因为盈余管理而产生的少纳企业所得税是可以接受的。据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假设2和假设3。

假设2:无论是政治关联公司还是非政治关联公司,向上盈余管理都存在税收成本。

假设3:政治关联公司获得向下盈余管理的税收收益,而非政治关联公司不能获得向下盈余管理的税收收益。

三、检验模型

为检验以上3个假设,可以运行如下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

$$RETR = \beta_0 + \beta_1 MDA + \beta_2 GRP * MDA + \beta_3 NPC + \beta_4 NPC * MDA + \beta_5 NPC * GRP * MDA + \beta_6 ConVars + \varepsilon \quad \text{式1}$$

其中,RETR是公司报告的实际税率。公司实际税率是已有文献中普遍采用的衡量公司税负的指标,如Porcano(1986),Shevlin and Porter(1992),Gupta and Newberry(1997),它等于(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Porcano,1986)。由于存在盈余管理,真实的利润是不可观察的,因此,计算公司实际税率采用的是管理之后的利润,因此,公司实际税率是受盈余管理影响之后的报告实际税率。

MDA为公司盈余管理。本文运用可操控性总应计利润衡量盈余管理,其计算采用调整的Jones模型(Dechow et al., 1995),同时采纳Kothari et al. (2005)的建议,采用调整的Jones模型来估计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时加入了截距项。这样,用以估计NDA的调整的Jones模型如式2所示:

$$NDA_t = \beta_0 + \beta_1 (1/A_{t-1}) + \beta_2 (\Delta REV_t - \Delta REC_t) + \beta_3 (PPE_t) \quad \text{式2}$$

其中: A_{t-1} :上年末总资产; ΔREV_t :(本年销售收入-上年销售收入)/上年末总资产; ΔREC_t :(本年应收账款净额-上年应收账款净额)/上年末总资产; PPE_t :本年末固定资产总额除以上年末总资产; $\beta_0, \beta_1, \beta_2$ 和 β_3 通过式3估计得到:

$$TA_t = \beta_0 + \beta_1 (1/A_{t-1}) + \beta_2 (\Delta REV_t) + \beta_3 (PPE_t) + \eta_t \quad \text{式3}$$

其中:TA为总应计利润除以上年末总资产。采用Jones(1991)的方法,TA的计算方法如4式所示:

$$TA_t = \Delta CA_t - \Delta CL_t - \Delta Cash_t + \Delta STD_t - Dep_t \quad \text{式4}$$

ΔCA_t :(本年末流动资产-上年末流动资产)/上年末总资产; ΔCL_t :(本年末流动负债-上年末流动负债)/上年末总资产; $\Delta Cash_t$:本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变化额/上年末总资产; ΔSTD_t :(本年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上年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上年末总资产; Dep_t :本期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其他长期资产摊销。根据式2、式3和式4,可以得到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总应计利润(TA)减去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即可得到调整Jones模型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MDA)。模型2采用分年度分行业的方法进行估计,其中行业依据《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进行划分,除了制造业采用两位代码进行划分,其他行业都采用一位代码予以划分。

式1中GRP为虚拟变量,如果MDA<0,则GRP=1,否则GRP=0;NPC为公司政治关联的虚拟变量,如果公司没有政治关联,则NPC=1,否则NPC=0;如果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曾经或者正在政府机构任职、担任全国或者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政协委员,那么公司有政治关联,否则公司没

有政治关联。GRP*MDA、PTS*MDA 以及 PTS* GRP*MDA 分别是相关变量的交叉项。

式 1 中的 β_1 表示政治关联公司向上盈余管理与报告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如果公司进行了向上盈余管理,那么,它使公司报告盈余变大;如果公司所缴纳的所得税没有变化,那么,报告实际税率应该变小。因此, β_1 显著为负,表示向上盈余管理并没有给公司带来额外的税收成本;如果 β_1 不显著,则表示向上盈余管理给公司带来了额外的税收成本。 β_2 表示相对于向上盈余管理,政治关联公司向下盈余管理对报告实际税率的额外影响。 $\beta_1+\beta_2$ 则表示向下盈余管理与报告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同样, $\beta_1+\beta_2$ 如果不显著,表明公司所缴纳的所得税是按照盈余管理之后的利润进行的,由于是向下盈余管理,表明公司得到了盈余管理所代理的税收收益。 β_3 表示非政治关联公司与政治关联公司在公司实际税率方面的差异,如果 β_3 显著为正,则表明非政治关联公司的所得税负担显著高于政治关联公司; β_4 和 β_5 分别表示非政治关联公司向上盈余管理与报告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向下盈余管理相对于向上盈余管理来说的对报告实际税率的额外影响,其含义分别与 β_1 和 β_2 相同。根据假设 1,政治关联公司的税收负担高于非政治关联公司,因此,预计 β_3 显著为负;根据假设 2,无论是政治关联公司还是非政治关联公司,向上盈余管理都给公司带来相应的税收负担,那么,预计 β_1 和 β_4 不显著;根据假设 3,向下盈余管理给政治关联公司带来税收收益,但不能给非政治关联公司带来税收收益,那么,预期 $\beta_1+\beta_2$ 不显著,而 $\beta_4+\beta_5$ 显著为负。

ConVars 表示控制变量,它主要用来控制影响公司实际税率的其它相关因素。根据已有文献,控制变量主要有:

(1)公司规模。关于公司规模与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公司受到公众更广泛的关注,这个“政治成本”将导致其实际税率较高(Zimmerman, 1983);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公司的实际税率较低,因为它们可以运用更多的资源进行税收筹划与政治游说(Siegfried, 1972)。已有研究在实际税率和公司规模之间的关系方面,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Zimmerman (1983), Gupta and Newberry (1997)和 Wilkie and Limberg (1990)发现实际税率与公司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orcano (1986), Holland (1998), Kim and Limpaphayom (1998)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 Stickney and McGee (1982) 和 Shevlin and Porter (1992)没有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2)财务杠杆。由于利息具有抵税功能,财务杠杆高的公司,其实际税率相对要低;相反,实际税率较高的公司,由于债务的利息具有抵税功能,因此倾向于举债,这样,也可能在实际税率与财务杠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Stickney and McGee (1982)发现公司的财务杠杆与实际税率负相关;Gupta and Newberry (1997)发现运用不同的计算实际税率的方法,财务杠杆与公司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可能显著负相关,也可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Kim and Limpaphayom (1998)运用不同计算实际税率的方法,对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财务杠杆与公司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其结论也各不相同;Derashid and Zhang (2003) 也发现财务杠杆与实际税率之间没有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3)资产结构。资产结构包括资本密集度和存货密集度两方面(Stickney and McGee, 1982; Gupta and Newberry, 1997)。由于长期资产的加速折旧可以降低税负,因此,资本密集度与实际税率负相关;而资本密集度高,往往意味着存货密集度低,因此,存货密集度与公司实际税率正相关。Gupta and Newberry (1997)发现资本密集度和存货密集度分别与实际税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Derashid and Zhang (2003) 也发现资本密集度与实际税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没有发现存货密集度与实际税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4)投资机会和获利能力。Spooner (1986) 在综合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认为公司实际税率在不同年度、不同行业之间的巨大变化,企业投资模式和获利能力是其两个重要的原因。在经验证据方面, Gupta and Newberry (1997), Kim and Limpaphayom (1998), Derashid and Zhang (2003)都发现,运用不同的计算实际税率的方法,分析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投资机会和获利能力与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其结论为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可能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5)名义税率。由于名义税率是计算企业应缴纳所得税的基本依据。根据 1993 年 12 月 31 日颁布并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我国企业所得税实行 33% 的比例税率,小规模企业执行 18% 和 27% 两档优惠税率。另外,我国对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沿海开放城市(14 个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地区(10 个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32 个城市)、专为台湾省设立的投资区(4 个区)、上海浦东开发区、保税区(13 个城市和地区)、高新技术开发区(52 个区)、边境开放城市(13 个)及苏州工业园区等等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因此,不同企业的名义税率并不完全相同,因此,需要控制名义税率对公司实际税率的影响。当然,名义税率越高,公司实际税率也越高,预计名义税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根据以上分析,控制变量所包含的具体指标及其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控制变量

变量类型	指 标	定 义
公司规模	SIZE	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	LEV	年末负债总额除以年末总资产
资本密集度	CAPINT	年末固定资产净值除以年末总资产
存货密集度	INVINT	年末存货净额除以年末总资产
获利能力	ROA	税前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
投资机会	MB	年末股票市场收盘价乘以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数,再除以年末所有者权益
名义税率	RATE	公司所得税名义税率

四、样本与描述统计

由于估计公司盈余管理需要现金流量表的数据,而中国 1998 年才开始规定披露现金流量表,因此,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1998 年至 2006 年的所有 A 股上市公司。研究样本还作了如下方面的处理:(1)剔除样本期内计算公司实际税率公式分母为负的公司,因为这部分公司通过公式计算得到的实际税率与正常公司的实际税率含义不同,不能反映企业经营业绩与企业实际税负的关系;(2)剔除实际税率大于 1 或者小于 0 的公司,作为异常值剔除,这种处理方法与 Gupta and Newberry (1997)、Kim and Limpaphayom (1998)、Singh et al. (1987)、Stickney and McGee (1982)以及 Zimmerman(1983)的处理方法相同;(3)剔除当年新上市的公司。由于计算递延税款的变动需要上年的财务数据,而当年新上市公司没有披露上年财务数据;(4)剔除金融行业的公司。这类公司业务特殊,适用的会计准则与其他行业不同,本文遵从研究惯例,予以剔除;(5)剔除极端值。计算出盈余管理(MDA)之后,将位于平均值正负 3 倍标准差以外的值作为极端值予以剔除。最后得到 6076 个观测值,具体分布如表 2 所示。1998 年共

有 266 个观测值,而 2005 年共有 950 个观测值,分别占有所有样本的 4.38%和 15.64%,是所有年度中观测值最少和最多的年份。而从整体上看,观测值数量随着年度的推进而增多,这与中国新兴股票市场的特征一致,即股票市场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

表 2 样本分布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合计
数量	266	406	486	562	722	847	910	950	927	6076
比例(%)	4.38	6.68	8.00	9.25	11.88	13.94	14.98	15.64	15.26	100.00

表 3 报告了描述统计。从全样本来看,公司报告实际税率(RETR)最大值为 0.9642,最小值为 0,显然,这是因为剔除了 RETR 小于 0 或者大于 1 的样本所造成的。名义税率(RATE)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0.33,这与我国部分公司免缴企业所得税,部分公司适用正常税率 33%一致;RATE 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2125 和 0.1500,明显低于正常税率 33%,这不仅是因为部分公司免缴企业所得税,还因为有大部分公司享受 15%、18%或者 24%等的优惠税率。公司报告实际税率(RETR)的平均值为 0.1617,也小于名义税率(RATE)平均值 0.2125,其原因在于计算 RETR 的利润与计算公司应缴纳所得税的利润之间存在差异。盈余管理(MDA)的平均值为 0.0098,而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5409 和 0.5356,表明中国企业同时存在着向上盈余管理和向下盈余管理。公司规模(SIZE)的平均值为 21.2129,财务杠杆(LEV)的最大值达到 0.9938,最小值则为 0.0091,表明中国公司在财务杠杆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样,中国公司的盈利能力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ROA 的最小值为 -0.0358,而最大值则为 0.4795,同样地,公司的投资机会(MB)方面也存在差异,最小值仅为 0.5728,而最大值则达到了 41500。表 3 还分组报告了描述统计。其中,MDA 为正的 political 关联公司共有 5270 个观测值,MDA 为负的政治关联公司共有 2854 个观测值,MDA 为负的政治关联公司共有 430 个观测值,剩余的 2276 个观测值则为 MDA 为负的非政治关联公司。不同组别样本之间在不同变量方面没有存在明显的差别。

表 3 描述统计

(1)全样本 (n=6076)					
RETR	0.1617	0.1162	0.1423	0.0000	0.9642
RATE	0.2125	0.0989	0.1500	0.0000	0.3300
MDA	0.0098	0.1202	0.0130	-0.5409	0.5356
SIZE	21.2129	0.9436	21.1078	17.8908	27.1111
LEV	0.4593	0.1728	0.4678	0.0091	0.9938
ROA	0.0532	0.0435	0.0449	-0.0358	0.4795
CAPINT	0.3121	0.1791	0.2878	0.0005	0.9489
INVINT	0.1561	0.1362	0.1235	0.0000	0.8807
MB	10.5494	532.5017	2.6262	0.5728	41500.0000

(2)MDA 为正的 政治关联公司 (n=5270)

RETR	0.1675	0.1285	0.1432	0.0000	0.8917
RATE	0.2003	0.1013	0.1500	0.0000	0.3300
MDA	0.0893	0.0777	0.0677	0.0001	0.4659
SIZE	21.3462	1.0785	21.2247	18.6019	26.9782
LEV	0.4318	0.1709	0.4302	0.0330	0.9803
ROA	0.0586	0.0462	0.0515	-0.0281	0.4555
CAPINT	0.3338	0.2055	0.2954	0.0008	0.9489
INVINT	0.1557	0.1572	0.1150	0.0000	0.8297
MB	4.2008	11.0855	2.8847	0.5728	243.3333

(3)MDA 为正的 非政治关联公司 (n=2854)

RETR	0.1601	0.1149	0.1409	0.0000	0.9642
RATE	0.2116	0.0990	0.1500	0.0000	0.3300
MDA	0.0877	0.0797	0.0665	0.0000	0.5356
SIZE	21.1699	0.9034	21.0872	18.3241	25.7409
LEV	0.4468	0.1760	0.4517	0.0108	0.9938
ROA	0.0540	0.0452	0.0447	-0.0307	0.4795
CAPINT	0.3162	0.1782	0.2913	0.0013	0.9414
INVINT	0.1620	0.1379	0.1271	0.0000	0.8627
MB	3.8383	17.3317	2.5798	0.6297	893.3333

(4)MDA 为负的 政治关联公司 (n=430)

RETR	0.1676	0.1201	0.1386	0.0000	0.8771
RATE	0.2049	0.0983	0.1500	0.0000	0.3300
MDA	-0.0949	0.0942	-0.0663	-0.5095	-0.0002
SIZE	21.4711	1.1343	21.2619	18.9792	27.1111
LEV	0.4848	0.1650	0.4843	0.0091	0.9475
ROA	0.0507	0.0388	0.0454	-0.0203	0.2276
CAPINT	0.3117	0.2058	0.2844	0.0017	0.9382
INVINT	0.1586	0.1620	0.1159	0.0000	0.7871
MB	100.1630	2001.0000	2.8370	0.6613	41500.0000

(5)MDA 为负的 非政治关联公司 (n=2276)

RETR	0.1612	0.1139	0.1437	0.0000	0.8252
RATE	0.2180	0.0980	0.1500	0.0000	0.3300
MDA	-0.0871	0.0839	-0.0612	-0.5409	-0.0001
SIZE	21.1871	0.9092	21.0780	17.8908	26.6324
LEV	0.4768	0.1683	0.4884	0.0091	0.9576
ROA	0.0514	0.0413	0.0438	-0.0358	0.4471
CAPINT	0.3019	0.1674	0.2822	0.0005	0.9393
INVINT	0.1482	0.1224	0.1222	0.0000	0.8807
MB	3.4701	3.5963	2.6179	0.6479	97.0000

说明:RETR=(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RATE:公司名义税率;MDA:运用调整 Jones 模型得到的操控性应计利润;SIZE: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LEV:负债总额除以总资产;ROA:税前利润/总资产;CAPINT: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INVINT:存货净额/总资产;MB:市场价值/所有者权益

五、检验结果

表4报告了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报告实际税率(RETR)。NPC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非政治关联公司的实际税负比政治关联公司低,其原因就在于政府给政治关联企业提供了资源,同时企业为此需要缴纳更高的企业所得税,以使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来实现社会目标。这样,它支持了假设1,即政治关联公司的税收负担高于非政治关联公司。MDA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表明政治关联公司的向上盈余管理与报告实际税率之间没有存在显著的相关性;NPC*MDA的估计系数也不显著,表明向上盈余管理对报告实际税率的影响在政治关联公司与非政治关联公司之间没有存在差异;而MDA的估计系数和NPC*MDA的估计系数之和也不显著,表明非政治关联公司的向上盈余管理与报告实际税率之间也没有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以上结论表明,无论是政治关联公司,还是非政治关联公司,它们的向上盈余管理都不影响报告的实际税率(RETR),表明公司利润被调高了,同时,公司所缴纳的所得税也被调整,导致报告的实际税率(RETR)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它说明公司是按照管理之后的盈余进行了纳税,即向上盈余管理带来了公司所得税的上升,从而提高了公司的税收负担。它支持了假设2,即无论是政治关联公司还是非政治关联公司,向上盈余管理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税收负担。GRP*MDA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对于政治关联公司来说,向下盈余管理与向上盈余管理程度和RETR之间的关系没有存在显著差别;同时,MDA估计系数和GRP*MDA的估计系数也不显著,表明政治关联公司的向下盈余管理与RETR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它表明政治关联公司在向下盈余管理情况下,就如其在向上盈余管理情况下一样,都是按照管理之后的利润进行纳税。但是,政治关联公司在向下盈余管理情况下按照管理之后的利润进行纳税,表明政治关联公司从向下盈余管理中得到了税收收益,其原因在于政治关联公司在进行向下盈余管理时,其会通过政治关联的管理层对税务部门进行游说,尽可能按照管理之后的利润进行纳税,这样,一方面盈余管理行为不会被揭穿,另一方面降低了公司税负;而从税务部门的角度来看,它已经从政治关联企业那里征收了更高的公司所得税,由于政治关联公司向下盈余管理所导致的少纳企业所得税是可以接受的。NPC*GRP*MDA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对于政治关联公司的向下盈余管理来说,非政治关联公司的向下盈余管理能够显著降低报告实际税率;GRP*MDA的估计系数与NPC*GRP*MDA的估计系数之和仍然显著为负,表明非政治关联公司的向下盈余管理能够显著降低报告实际税率。其原因在于非政治关联公司虽然调低了公司利润,税务局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同时非政治关联公司又不具备游说能力,因此,公司按照管理之前的盈余进行纳税,这样,非政治关联公司并不能从向下盈余管理中获得税收收益。以上两方面支持了假设3,即向下盈余管理给政治关联公司带来税收收益,但不能给非政治关联公司带来税收收益。